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超拔与悲怆

——路翎小说研究

周 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超拔与悲怜

——路翎小说研究

周 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拔与悲怆：路翎小说研究/周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8

(历史与现场丛书)

ISBN 978-7-5161-9546-8

I. ①超… II. ①周… III. ①路翎(1923-1994)—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70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6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十多年前我到沈阳师范大学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任职，周荣是研究所最早的几位硕士研究生之一，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张充满阳光的笑脸。毕业后她又留在研究所工作，干的是很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她显得很忙碌。但我发现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摆着一些学术著作，我由此知道她对专业仍然非常上心。果然两年后，她又考上了吉林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读研期间，她偶尔会回到研究所来看看。四年后，她博士生毕业了，我们研究所把她召了回来，我们又成了同事。我发现，虽然一转眼就是八九年的光景，岁月在我们身上也刻下了痕迹，但周荣的那张充满阳光的笑脸依然没有变。

这部专著是周荣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记得她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时，曾将她的选题方向告诉过我，还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她选择了一座难以攻克的碉堡，也为她有这样的勇气而高兴，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路翎，对她的论文提不出什么建议。后来她把论文做出来了，也发了一份电子版给我，实话说，读了之后我还是大为惊喜的，我没想到她做得这么认真和扎实。但她仍不满意，这次出书，她又反复进行了修改，使其论述更加严谨和充分。当她将定稿交给我时，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我为她的这本书写序。尽管我马上答应了，但内心还是犹豫的，因为我毕竟不是研究路翎的专家，而且在周荣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基本上也没有给予帮助。从这个角度说，让我来写一篇序言，对她这部著作进行学术评价，那显然我是



不够格的。但是，我与周荣从师生关系到同事关系，十余年来，我见证了她是如何从一名爱提问的研究生逐渐成长为一名文学专业的大学教师及研究者的。我应该通过写序来表达我对她的支持和赞赏。

路翎是一位长期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家，尽管新时期以后对路翎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丰富；路翎在文学史中也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作家，对于路翎的评价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颠覆。因此，我说研究路翎是一座难以攻克的大碉堡。周荣曾对新时期以后的作家和作品特别感兴趣，也做了相当的积累，最驾轻就熟的方法就是在原来的积累上选择论文方向，但她最终选择了大碉堡，显然她希望以此种方式拓展自己的学术空间，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读到她的最后定稿，我很惊喜，因为我看到了她进步的步伐是如此之大。周荣在路翎研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深入拓展，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她拎出的两个核心词：“超拔”与“悲怆”，可以说是对路翎文学品质的精准把握。关于超拔，周荣认为：“《财主底儿女们》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建立了一种超拔的精神标杆——对道德感和精神‘纯度’的要求，不‘乞求’于‘大我’肯定的‘小我’个体意识，以及与精神倾向相匹配的文体形式，这是路翎创作对长篇小说发展的贡献。”现实主义从“五四”新文学诞生起就与启蒙主义紧紧铆合在一起，无论是左翼文学还是延安文学，都是以现实主义作为其理论依据的，这种现实主义强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用当前的时髦语说，就是要“接地气”，要“贴着地面行走”。路翎从文学谱系上说应该归入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系列之中，但路翎从一开始就将异质带入现实主义写作之中，这种异质便是作者强大的主体意识，胡风将其概括为“主观战斗精神”。显然这与现实主义向下的、向现实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它指向精神，它试图超越现实，因此具有一种超拔的特征。周荣在比较路翎以及七月派与延安文学的“殊”与“同”时，重点分析了路翎的这一特征。关于悲怆，我以为用这个词来概括路翎小说的基



调或风格是非常贴切的。在路翎的小说中，不乏死亡意象、苦难叙述、绝望情绪、孤独意识这些元素，这些元素共同演奏了一支悲怆交响乐。当然，周荣并不是以这两个核心词作为论文的基本框架的，她大致上还是以路翎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为线索进行论述的，但在具体论述中，她围绕着“超拔”和“悲怆”进入路翎的文本，就能抓住文本的灵魂。周荣的不少观点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例如，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主要人物蒋蔚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是人们论述得比较多的对象，周荣将其置于整个现代文学的人物谱系中，与巴金等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从现代文学史中的“长子”悲剧命运中发现路翎的突破，她将路翎所书写的“长子”蒋蔚祖称为“夹心人”。周荣还强调了路翎在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并通过对短篇小说的研究，认为路翎的风格具有多重性，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表现出迥异于长篇小说的别致、灵巧的风格。这些论述无疑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从我个人的学术偏好上说，我特别乐意看到周荣选择了路翎，因为我认为路翎是一个被文学史低估了的作家。在文学史叙述中，总会有一些作家被高估，有一些作家被低估。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学史观有问题。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在文学史观上进行突破，而被高估或被低估的作家就是最恰当的突破点。这也就是我特别乐意看到研究者在被高估或被低估的作家身上做文章的原因。路翎的被低估，就在于他本来是从革命文学的阵营里出发的，却在一出发时就显示出鲜明的异质。在20世纪40年代末，路翎刚刚冒出头时，马上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但他的异质同样也马上引起革命阵营的警觉，胡绳很快写出了批评长文《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对路翎的创作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路翎是在始终不断的批评声中继续他的文学之路的，不能不说这些批评对路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也很深远的影响，因此他后来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这带来了路翎文学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人们对路翎的争议难以尘埃落定。如果说，过



去对路翎的低估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那么，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涉在今天已经不是突出的问题了，为什么人们对于路翎的评价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显然只能用路翎文学的过于复杂来解释。一个作家越复杂也许越有研究的价值。当然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想破解作家复杂性的密码，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质疑的精神。我以为，学术研究必须具有质疑的精神，有所质疑才会有所突破。周荣在这本著作中能够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也是与她敢于对以往观点进行质疑大有关系的。不过，就质疑精神来说，我还想对周荣提点建议。一方面，我觉得周荣质疑的力度还不够，否则的话，她对某些观点的论述将会更加深入和透彻。另一方面，我觉得周荣的质疑还不太彻底。所谓彻底，就是说质疑应该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对既有的观念质疑，而且也要对自己进行质疑。比方说，她断定路翎晚年的创作“乏善可陈”，这样的结论就给人感觉是把话说得太满了。不妨先对自己质疑一番，因为这样的结论很难体现出路翎的复杂性来。绝大多数从现代文学史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强大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自觉不自觉地戴上面具进行文学写作。路翎同样如此，但路翎又是一位对主体性特别敏感的作家，因此在他的内心，始终会存在两个“自我”，一个主体性的自我，一个戴着面具的自我。我以为，这种状况在他晚年政治上得到平反后仍然存在，而从他的晚年创作中，可以发现这两种自我是如何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如果以这样的思路去读解路翎在晚年创作的数量不菲的诗歌和小说，就会透过文字表面发现一个隐晦、孤独甚至有些被扭曲的灵魂。这也说明，周荣对路翎的研究还可以继续做下去。我对周荣的建议也许不切实际，但也是由于我期待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收获更多的果实啊。

贺绍俊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路翎创作概述	1
第二节 路翎小说研究综述	6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18
 第一章 融合与拓新：路翎与现代文学传统	22
第一节 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22
第二节 长篇小说的文体贡献	36
第三节 人物形象及精神内涵	47
 第二章 革命文学谱系中的“殊”与“同”	58
第一节 “农民”或“人民”的不同想象	59
第二节 语言的“政治”	81



第三章 《财主底儿女们》与知识分子叙事	101
第一节 传统文化崩溃时代的“夹心人” ——蒋蔚祖	104
第二节 多元“主义”角逐中的“徘徊者” ——蒋少祖	120
第三节 革命高涨时代的“探索者” ——蒋纯祖	138
第四章 大时代不受“欢迎”的人	160
第一节 20 世纪 50 年代的转变	160
第二节 工人题材小说：不彻底的蜕变	168
第三节 志愿军题材小说：“大叙事”与 “小叙事”的纠结	183
第四节 “一生两世”与“劫后余生”	207
结 语	219
附 录	222
参考文献	234

绪 论

第一节 路翎创作概述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仓米巷35号，在南京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抗战爆发后，辗转武汉、重庆多地求学、谋生。路翎自幼喜爱阅读和写作，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抗战中，路翎开始向报刊投稿，1938年，他陆续发表了散文《秋在山城》《在襄河畔》《一片血痕与泪迹》等。1940年，年仅17岁的路翎在《七月》上发表小说《“要塞”退出以后》，标志着七月派最重要的作家，也是20世纪40年代最重要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43年，《饥饿的郭素娥》出版，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极具冲击力的美学风格在文坛和评论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讨论。20世纪40年代，路翎佳作不断，陆续出版了小说集《青春的祝福》《在铁链中》《求爱》，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下）。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政治环境与文学规范的变化，路翎在创作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他多次深入工厂一线，实地体验生活，出版了反映新社会工人劳动生活的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又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创作了《“洼地”上的战役》



《初雪》《战士的心》等志愿军题材小说，出版了散文集《板门店前线散记》，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这些作品虽在读者中获得赞誉不断，却遭到了密集的政治批判。1950年，路翎由南京调入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创作的剧本《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不仅未能公演，而且受到多方批判。1955年，路翎因“胡风案”被捕入狱，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文革”后，路翎重新拿起笔，积极恢复创作，但二十多年的牢狱之灾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艺术才华，艺术水准已大不如前，虽然创作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但大多乏善可陈。

正所谓“史家不幸诗家幸”。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战争阴云密布，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分区而治。20世纪初的文坛也因不同区域间政治文化和文艺导向的差异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多样形态：一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文坛的作家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另一批极具冲击力的新锐作家又横空出世。国统区的路翎、解放区的赵树理、沦陷区的张爱玲等作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个人美学风格，也为文坛贡献了新鲜各异的文学经验。这些“专属”20世纪40年代的“新”作家与老舍、巴金、曹禺、沙汀等“老”作家，一起构成了20世纪40年代多样共生的文坛生态。路翎一“出场”便以其沉郁、凝重的风格，尖锐、复杂的心理刻画引起关注。在短短几年里，他在小说、散文、评论上佳作不断，迅速走到了文坛的“第一线”。作为七月派最重要的作家，路翎深为胡风所器重，得到了胡风的大力帮助与支持。路翎文学创作与胡风文艺理论之间彼此印证、支撑的互动缠绕，以及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既为路翎在文学道路上的“腾飞”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日后不幸的个人遭际埋下了伏笔。路翎的创作从“现代文学”的“四十年代”延续到“当代文学”的“十七年”，再到努力重返文坛的“新时期”。他在20世纪40年代和“十七年”都留下了足以代表当时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又常常发出与主流相异



的不和谐“声音”。可以说，路翎既是一位才华横溢、锐气逼人的天才，又是一位充满“争议”与矛盾的作家。而在当下的文学研究格局中，对路翎的研究日趋“边缘化”，当一个作家离我们的文学生活越来越“远”的时候，也许恰恰是在提醒人们，空间的距离与时间的检验是重新认识一个作家的最好契机。

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既要宏观上梳理、把握作家的整体创作情况，在文学史流脉中“定位”作家，确定价值坐标，又要从文学内部对作家创作的特质、流变做出细致的辨析。路翎的小说创作时间跨度长，风格变化较大，为了便于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有必要对作家的创作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从时间和艺术风格上综合考量，路翎文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创作准备期；19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高峰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55年，创作转型期；1980年至1994年，创作复出期。这样划分的依据有两个方面：一是路翎不同时段创作实绩和风格变化；二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和社会变革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1938—1940年，创作准备期

1937年抗战爆发后，路翎跟随家人到达武汉，后辗转进入四川，躲避战火。这期间路翎开始向报刊投稿。1938年，他在《时事新报》副刊上发表《秋在山城》《夜渡》《在襄河畔》《高楼》等多篇散文；在《大声日报》上发表《在空袭的时候》（散文）、《血底象征》（诗歌）；署名“烽嵩”在《弹花》上发表散文《一片血痕与泪迹》；1939年在《大声日报》文艺副刊上连载小说《朦胧的期待》，这是路翎的第一部小说作品。遗憾的是，这些作品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无法判断它们与路翎之后的创作具有怎样的内在关系，只能暂时把这段时期的创作视为路翎正式走向文坛前的“练笔”和准备。其间，路翎出众



的文学潜质和才情吸引了合川民营刊物《大声日报》的注意，他被邀请编辑文艺副刊“哨兵”，任职“哨兵文艺社主编”。虽然名曰“主编”，但除了路翎的好朋友偶尔给写写稿子外，副刊的编辑和撰稿基本上由路翎一人承担。

1940—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创作高峰期

1940 年，路翎的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在胡风主持的《七月》上发表。1940—1945 年，路翎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反映矿山和工人生活的小说：《家》《何绍德被捕了》《祖父底职业》《黑色子孙之一》《卸煤台下》等；反映知识青年精神动向的小说《青春的祝福》《谷》等。这些作品中，路翎文学的一些标志性特征——对知识分子、具有流浪汉气质的人物的青睐，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关注与追索，欧化、繁复的语言风格，沉郁、涩滞的叙事风格——已经形成。

1943 年，路翎的代表作《饥饿的郭素娥》出版，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1945 年，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上）出版，1948 年，《财主底儿女们》（下）出版，胡风称之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这一时期，路翎的重要作品还有《蜗牛在荆棘上》《罗大斗底一生》《王兴发夫妇》《王炳全底道路》等，出版小说集《求爱》《在铁链中》。20 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路翎对多种题材的驾驭、叙事节奏的控制、故事结构的安排、人物心理的把握都更趋娴熟，塑造了各类性格复杂的人物；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与中、长篇小说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轻巧、灵动，嘲讽中带有批判，冷峻中蕴藏浓烈。这些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不仅丰富了路翎文学的多样性，也体现了路翎多样的艺术才华。

1949—1955 年，创作转型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政治环境和文艺规范的要求，路翎在文



学题材、语言、主题上做出了较大的改变，呈现出“化繁为简”的趋势。1952年，路翎出版了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收入其中的多是中短篇工人题材小说；1953—1954年，陆续发表了志愿军题材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初雪》《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诚的同志》。其中《洼地上的“战役”》代表了路翎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是“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他的长篇志愿军题材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创作完成后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在当时发表。这一时期的路翎意图在创作上响应意识形态的要求，但作品呈现的“异质性”又与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要求相抵牾。这些作品在当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恰恰是这些“异质性”因素和独特的表达构成了其作品重要的艺术价值所在，为我们反思文学与政治、主体与规训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和经验。

1980—1994年，创作复出期

20世纪80年代，平反后路翎重新投入创作，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但发表的只有《钢琴学生》《拌粪》《海》等很少一部分。路翎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紧紧围绕“文革”后的社会生活，歌颂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和谐平等的社会氛围，描绘新时期祖国的宏伟蓝图。作品努力追随社会公共话题，借以表达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热情，格调昂扬，浅近平易。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有所欠缺。1998年，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结集出版为《路翎晚年作品选》。

客观地说，路翎复出后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没有贡献新的经验，反而丧失了作家独立的思考和艺术个性。而路翎不幸的个人命运和坎坷的艺术道路却为我们反思那个政治化的时代，思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鲜活而宝贵的例证。



第二节 路翎小说研究综述

对路翎小说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路翎初登文坛到 1949 年，第二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5 年，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第一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路翎小说研究状况

20 世纪 40 年代对路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思想价值等方面，重要的文章主要出自胡风、邵荃麟和胡绳，此外刘西渭、冯亦代、唐湜等也有评论文章。

作为“七月派”的灵魂人物，胡风的评论文章对路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1942 年，胡风为《饥饿的郭素娥》写序言《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①，这是介绍和研究路翎的最早的重要文献。胡风肯定了其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新颖和成功，“替新文学的主题开拓了疆土”，通过人物的命运反映出底层人民的精神动向和他们身上蕴藏的“原始强力”，体现了路翎追求人物精神深度的艺术特色。胡风同时也指出，作家结构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能力还有所欠缺，理性分析不足。胡风的另外一篇重要评论文章是《财主底儿女们》的序《青春底诗》^②，写于 1945 年。胡风高度赞扬了小说所展现的广阔的生活场景“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和“现象底巨大俱收的罗列”，而是提炼出“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真实地刻画了各

① 杨义等编：《路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53 页。

② 同上书，第 60—64 页。



类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的痛苦和挣扎。胡风站在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角度，认为《财主底儿女们》继承和发扬了鲁迅开创的传统，同时吸收了外国现实主义的优秀资源，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胡风的评价对《财主底儿女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文章对小说的人物形象、思想意义、文学史地位的概括切中肯綮，显示了论者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敏锐的艺术鉴赏力，但他的论断和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续研究的视野和拓展。

胡风也是最早从文学史的角度阐释路翎文学价值的批评家。首先，路翎在塑造人物上的创新和深化，“新文学里面原已存在了的某些人物得到了不同的面貌，而现实人生早已向新文学要求分配坐（座）位的另一些人物，终于带着活的意欲登场了”^①。其次，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深入关注，他认为路翎的作品不只提供了“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和“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还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的表情，每一个动作的潜力的深度和立体”。^② 胡风准确地抓住了路翎 20 世纪 40 年代中前期创作的艺术特点。胡风的推介与评述不仅奠定了路翎研究的高起点，也为路翎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成熟并为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

20 世纪 40 年代对路翎小说做出评价的另外两位革命文艺理论家是邵荃麟和胡绳。邵荃麟在同名文章《饥饿的郭素娥》中^③，站在“新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上肯定了《饥饿的郭素娥》的历史地位，认为作品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类灵魂的呼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内涵空间，通过郭素娥、魏海清“叫出了多世纪来在

① 杨义等编：《路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1 页。

② 同上书，第 53 页。

③ 同上书，第 54—58 页。



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邵荃麟还特别注意到了路翎文学所特有的高密度、强力度的心理描写。而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① 则对路翎创作提出全面批判，批判的重点集中在：（1）没有写出“真实”的工人、农民，路翎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思想特征强加到农民、工人身上，有失真实；（2）关于知识分子的出路，路翎作品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茫、颓废的气息，没有写出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和人民的结合，改造自我的过程；（3）人物心理描写的不真实，为了配合作者所强调的“原始强力”“精神奴役的创伤”而偏执于描写“神经质人物、疯子、流浪汉”的精神世界，这说明作者的创作“那就是越来越离开真实的生活。作者所‘寻求’的是那些空洞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胡绳虽然对路翎创作持否定意见，但其对路翎创作特色和精神内涵的把握却不失敏锐、准确。胡绳与胡风、邵荃麟的意见分歧既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政治走向的“风向”，也是革命文艺内部一直存在的分歧与论争的反映。

刘西渭和唐湜主要对路翎小说的美学形式和风格予以分析评价，他们都注意到路翎作品中情感浓烈的特点。刘西渭的文章《三个中篇》认为^②，“拙”和“冲”构成了路翎小说强大的冲击力，“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同时也指出了路翎创作中两个重要问题：语言“机械化”“欧化”带来的阅读的“涩室之感”；人物性格超出生活真实，“‘满足于一个孤立的人格’——作者自己，艺术因而有所损失……每每有一部分不在生活以内”。唐湜的文章《路翎与他的〈求爱〉》^③，比较早地观察到路翎创作上的变化和成熟，认为路翎 20 世纪 40 年代中

① 杨义等编：《路翎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7—103 页。

② 同上书，第 69—70 页。

③ 同上书，第 78—86 页。